

近代扬州文人群体研究 (1840~1945)

THE STUDY OF LITERATI
IN MODERN YANGZHOU (1840-1945)

王宁宁 / 著

| 优 | 势 | 丛 | 书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优 | 势 | 丛 | 书 |

近代扬州文人群体研究 (1840~1945)

THE STUDY OF LITERATI
IN MODERN YANGZHOU (1840-1945)

王宁宁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扬州文人群体研究：1840-1945 / 王宁宁著

·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优势丛书）

ISBN 978-7-5201-0519-4

I. ①近… II. ①王… III. ①文学流派研究-扬州-1840-1945②文人-人物研究-扬州-1840-1945 IV.
①I209.953.3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6573 号

优势丛书

近代扬州文人群体研究（1840~1945）

著 者 / 王宁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维

责任编辑 / 单远举 常 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 /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519-4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扬州大学“优势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夏锦文 周新国 姚文放

委 员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平	田汉云	华清君	刘拥军
吴善中	柳 宏	胡学春	张 清
俞洪亮	秦兴方	钱玉林	钱宗武
蔡宝刚			

总 序

2014年5月，扬州大学的“文化遗产与区域社会发展”学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本优势学科以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法学三个一级学科为依托，由经典诠释与传承研究、文艺理论前沿与区域雅俗文化研究、传统学术与江苏地域文化创新研究、淮扬历史文化遗产研究、法律文化与区域法治发展研究五个主要学科方向组成。

本优势学科的宗旨，是紧紧围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江苏文化强省战略，追踪学科前沿，造就领军人才，面向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优势学科的建设。首先，是促进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开辟学科新方向与科研增长点。凸显本学科原有特色，强化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协同合作、跨越发展，显著提升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其次，是充分发挥学科整体优势，产生具有显著效应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交叉整合学科现有资源，加强与国内科研院所和地方文化部门的协作，集中力量，协作攻关，纵贯古今学术，会通中西文化，深入把握雅俗文学嬗变与地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再次，是强化学术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建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体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面貌、特质、形态、规律，进一步开拓区域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最后，是探索服务区域社会的运行机制，发挥服务区域社会的实际功能。积极发挥高校人才高地优势，多元探索社会服务途径，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应，多方位、多维度、多层次地为区域社会、文化和法治发展服务。

在上述诸多工作中，本优势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一套系

列丛书。拟以两年为一期,每期15种;四年两期共30种。考虑到与“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相一致,取名为“优势丛书”。

回顾以往,扬州大学文科的重点学科建设经历了曲折而璀璨的道路:2006年文艺学学科获批“十一五”江苏省重点学科;2011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批“十二五”江苏省级重点学科;2012年中国史学科获批“十二五”江苏省级重点学科。而2014年“文化遗产与区域社会发展”获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则是在以往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基础上更上层楼。其间,扬州大学承担了参照“211”工程二期项目“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和参照“211”工程三期项目“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建设,在这两期项目中均有大型丛书的建设任务,前者为“扬泰文库”,共四个系列,计90种图书;后者为“半塘文库”和“淮扬文化研究文库”两个系列,计50种图书。这两套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力推助了扬州大学文科各学科科研质态的优化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主涉学科后来获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功不可没。

如今作为优势学科建设的重头戏,又面临着新的大型丛书“优势丛书”的建设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们不敢稍有懈怠,矢志全力以赴,将团结学科团队全体成员,像以往一样,出色地完成“优势丛书”的出版工作。

最近,“江苏省‘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总目标下,将继续大力支持江苏高校优势学科的建设,以提高江苏省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我们将不遗余力,乘势而上,借助以往学科建设的经验和实践,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和卓著的成果,为新一轮优势学科的建设奠定扎实的基础。

“优势丛书”的问世,汇聚着教育部、江苏省教育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审稿专家的大量心血,凝聚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扬州大学“优势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6年8月

内容摘要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即南北汇集之地，久为东南经济文化枢机、士之渊藪。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扬州文化所独具的特殊文化生态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席位。自春秋建城，扬州经历了数度起伏和兴衰交替。国强则盛，扬州是商贾的财富天堂，文人的精神乐园，农工的寻梦之乡。国微则衰，家国离散、战火纷乱一度使扬州成为“芜城”。但是扬州每次都能与中华文明一起再度焕发青春，废池乔木而再度复兴，长期稳居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位置，直到中国步入近代历史的大门。晚清民国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扬州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由传统“文士结构”向近代“知识分子结构”的蜕变历程。这种身份变迁的整体社会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然隐含了整个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总是自觉地跟随时代，而非创造和引领潮流。近代扬州的文人群体，继承了传统文人的风雅余绪，在转型期中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在“断裂时代”的探索和蜕变。

Abstract

YangZhou is famous as a classical cultural city tha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center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The unique civilization of YangZhou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city had possessed highs and lows, waxed and waned several times. YangZhou was businessmen's heaven, academics' garden, workers and peasants' dream land when country was boom. Instead, the war made the city became a deserted place for country's decline. However, YangZhou had resurgenced with the country everytime until modern times. In a time of change of Qing Dynasty to Republican period, YangZhou's intellectuals begin to the metamorphosis of classicality into modern. The changing process implied the destiny of whole Chinese intellectual—they always fit the times with unconsciousness instead of made an epoch. Intellectual of modern YangZhou inherited the classical characteristic and showed the groping process of whole group in China.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扬州建置沿革	1
第二节 文人概念析定	3
第三节 近代扬州文人研究之意义	8
第四节 近代扬州文人研究之现状	10
第一章 封闭与开放：近代扬州文人的社会生态	12
第一节 历史的记忆：消费城市与士之渊薮	12
第二节 落日的余晖：晚近扬州城市的衰落	30
第三节 西潮的渗透：西风东渐之下的迎拒与选择	55
第二章 结社宴集与交谊网络：新旧杂糅的文化生活	69
第一节 怀古仿旧：传统文化脉象的延续	70
第二节 弱社会中的遁世情结：以茶馆为中心的文人生活	89
第三节 从身份到职业：新型知识群体及其文化理想	104
第三章 “文人固穷”与职业多元：文人的经济生活	119
第一节 近代扬州文人的生存境况	120
第二节 文人经济观的传承与变异	139
第三节 职业多栖：文人职业流动与身份重构	146

第四章 转型期中的“文治势力”：居扬文人参与近代政治	163
第一节 “自卫团防夜不收”：辛亥革命时期的扬州文人	164
第二节 “书生造反凭空手”：北洋军阀时期的扬州文人	179
第三节 “金石坚贞晚节心”：抗日战争时期的扬州文人	186
第五章 “觉”与“昧”的二重奏：西潮冲击下的救亡与现代化	
实践	197
第一节 风动潮涌：1868年扬州教案中的官绅文人	197
第二节 弃旧图新：文人与扬州近代化	211
参考文献	224

绪 论

第一节 扬州建置沿革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即南北汇集之地，久为东南经济、文化枢机。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扬州”一称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相传大禹治水之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扬州被列为九州之一。《禹贡》篇中载有“淮海惟扬州”，意指淮水到东海之间皆属扬州地域。因古汉语中“维”通“惟”，扬州又称“维扬”。《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九州之说”先秦以后文献多从之，“九州之说”中的扬州范围相当于以今天浙江绍兴为中心的中国东南部地区，是一个广阔的行政区划，包括了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大部以及广东、湖北、河南部分地区。与近世扬州相比，“九州之说”中的扬州地域虽广，然仅限广袤的自然区域，而非行政区划，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等，仅天下体系宏大叙事之宽泛部分而已。

现实政治社会历史中，扬州的名称和建置屡次变更，辖区范围也与“九州之说”中的扬州有很大不同，仅为“淮海惟扬州”其中一隅。通过历史对比，以近代行政地域为中心进行考察，可知扬州最早构土为城于公元前486年。《左传·哀公九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俘虏越王勾践之后，野心膨胀，欲北上伐齐以霸中原，

^① 另有一种标点方式是“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出于军事目的在古干国都城的旧址上建立了蜀冈邗城，为军事、后勤基地。为了运输北上的粮草，夫差还疏通了江淮之间的水路，“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①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人工运河“邗沟”。扬州，始有邗城之名。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公元前319年，“楚怀王槐城广陵”，因蜀冈是一片丘陵，故建城名为广陵，有“广为丘陵”之意，是有广陵之名。此处的广陵不等同于九州之一的扬州，而是一种内含于的关系。据《扬州府志》载：“扬州之名昉于禹贡，广陵其境内地也。”

秦汉以后，扬州区域的名称反复变迁，所辖地域也屡有变化。西汉称吴国、江都国、广陵国，东汉至两晋称广陵郡，刘宋改南兖州，北齐改东广州，北周改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置扬州总管府，扬州自此享有“扬州”之专名，可见扬州在隋代以前并不同于今日扬州之地理属性。南北朝朝民歌中频频出现“扬州”一词，如“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等，那么南北朝时期的“扬州”到底在何处？近代刘梅先有诗解疑：“腰缠骑鹤上扬州，富贵神仙实缪悠。吾郡开皇名始改，世人偏说广陵游。”^②诗中纠正“腰缠骑鹤”所去的“扬州”乃是建业，而非广陵。古扬州的区域范围十分之广，治所在南京，而今天的扬州仅指古扬州的一部分，即广陵。古今异义之例，于历史沿革之际尤多，此即明证。从现代人的文化接受程度来看，大多数人更乐于接受此处的“扬州”就是今之扬州市，今人所犯的“错误”亦已形成文化心理、历史习惯，扬州文化意指上的延续性与稳定性进而也带来日常历史感的地域稳定性。考证之明晰与生活之含混并不矛盾，大可不必常怀纠错之设想。

隋炀帝登基后，扬州名称又有小规模变动，大业初年（605），复改扬州为江都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改为兖州，六年（623）改为邗州，九年（636）改为扬州，置大都督府。但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一度又改扬州为广陵郡。诗人高适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所任官职为

① 《左传·哀公九年》，载《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763页。

② 刘梅先：《扬州杂咏》，广陵书社，2000，第1页。

“广陵（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史”，正是在扬州改为广陵郡的期间。直到肃宗乾元三年（760），方又改回为扬州，自此扬州之名才算定型。“广陵郡被扬州之名，肇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再见于唐高祖武德九年，三定于唐肃宗乾元元年。至是扬州之名，惟广陵得以专之。”^①

此后，扬州的名称和区划又经过数次变动，至明清之际基本稳定下来。清军占据扬州后，其建置沿袭明制，扬州府辖江都、仪征、泰兴三县和泰州、通州、高邮三州，州领四县即兴化、宝应、如皋和海门。康熙十一年（1672）废海门县，余地并入通州。雍正二年（1724），废除州领县的制度，将通州从扬州割除，同时划出泰兴县和通州所领的如皋县。雍正九年（1731），在江都北境设立甘泉县。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泰州东境设立东台县。时至晚清，扬州府领二州六县，二州为高邮和泰州，六县为江都、甘泉、兴化、东台、宝应和仪征（宣统元年改称扬子县），时称“扬八属”。此建置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其间，太平天国起义军曾三次占据扬州，共计296天。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设置江南省，下辖江宁、镇江和扬州三郡。扬州郡领江都、甘泉（时称甘泉天县）和仪征三县，“所占土地仅为扬州、仪征两城及其城郊，扬州府其余辖境皆为清军所控。”^② 民国成立后，甘泉县并入江都县，废除州制，将泰州、高邮改为县，扬州只留其名，城区属江都县管辖。宣统时期的扬子县复称仪征县。这种建置一直维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第二节 文人概念析定

本书研究以近代扬州的文人群体作为考察对象，欲茂其末，先固其本，须对“文人”做出相应的界定，厘清中国文人阶层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传承久远的独特社会文化阶层，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其角色与身份也在不断地发生衍化、转型。令人惊叹之

^① 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4页。

^② 吴子辉：《扬州建置笔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70页。

处在于：在衍变流传中，文人阶层的面貌保持了薪火相传之连续性，此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间自有某种耦合与关联。综合不同历史时期来看，“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和“新文化人”具有某种程度的蕴意重叠与功能吻合。从科举时代“以文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到清季民初商业化市场中“以文谋生”的职业文人，再到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以文启蒙”的“新文化人”，概念迁变和内涵演进缓慢勾勒出中国文人阶层从“文士”身份到“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历史印迹，也见证了中国知识人在嬗变过程中不断寻求价值定位、精神人格的探寻历程。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而言，‘文人’与‘士大夫’的确是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①这种现象是传统文人“文士同构”身份特性的一种表征。“文士同构”的古典身份属性从春秋时期开始生发。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各国君主急需“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其自然政治后果是原先“以力服人”的统治阶级，在暴力系统之外更注重文官价值系统的作用，以利用文人“替他的政权带来法律和秩序，提高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②文士递进的传统在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后更为彰显，且逐渐地走向制度化、固定化，这使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表现为一种“文人政治”。技艺性的文人和政治性的士大夫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而是存在自然性质的过渡，从而构建起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最大特点——极早就建立了社会的上下流动渠道。马克斯·韦伯将中国士大夫定义为“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训练有素并科考过关的文人”。他注意到，“中国以极具排他性的方式把文学教育作为社会声望的评价标准”，士人在其中“得到的是一种文学教育，特别是书写造诣，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是依靠这种书写与文学造诣”。^③在这种共同体语境下，读书人以治学

① 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② 杜维明：《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第33页。

③ [德] 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第92、415、416页。

始，道德文章是安身之本，而“走出书斋，匡治天下”则是他们立命之目标。

“文士同构”也意味着中国式文人从未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或稳定的行业建制。他们一开始就没能形成独立的文艺群体，但拥有自洽的美学目标和价值追求。文人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另一重文化身份，与官（绅）、儒（师）并列。文人通过学习可以成为朝堂之士，《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这种跨界性的身份结构不仅在知识内容和精神追求上使古典文人的内涵向度走向范式化，更赋予文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四民之首。文人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享有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农、工、商——的特殊地位。文人的优越性地位不仅表现为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还体现在世俗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特别是服舆器具上。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中有“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之描述。明代更是采取中央集权式的手段对各阶层的服饰进行种种限制，儒士、生员、监生等读书人大多穿襦衫或直裰，商人、农民则不许穿着这些款式。衣料方面，文人、农民以绸、纱、绢、布为主，而商人只准用绢、布。此种差异是礼制文化“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社会阶层划分之体现，文人在等级差序的格局中，由于与士有天然的亲近关系而一直备受优待。

天道无常，唯变为恒。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以超稳定性见著于世界历史，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打开了全球化的“潘多拉魔盒”，超稳定俨然成为超封闭与超滞后的同义语。19世纪后半期，全球化在枪炮声中撞开华夏帝国的大门，“文士同构”的传统模式也在硝烟中走向解体，中国自此萌生了近代意义的“职业文人”。伴随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启，特别是科举变革及近代报刊市场的兴起，一些文人或自觉远离士大夫晋升之“正途”，或被迫放弃以“文砖”敲“仕门”之愿想，从而加速了文士分离、文政解构的社会进程，推动了传统文人阶层走向近代化与职业化。近代职业化文人最早涉猎的专业领域是报刊新闻。早期步入报业的文人多为仕途蹇滞或官场失意者，因社会的“正途”依旧是科举，所以文人从事新闻事业通常被看成从事“不名誉之职业”，是“落拓文人”和“狂疏学子”

的无聊之举，难免遭到世人轻视，然其毕竟代表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动向：文人不再将政治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他们开始通过立足近代公共传媒掌握“另类”的政治参与权、道统话语权，“文人”逐渐成为一种近代化的职业。其中奥义在于，报刊是近代产物，内在逻辑是市场化、效率化，民众而非官场的关注才是其生存之道和发展关键。文人就食于报界，表面仅是职业的转换，实质却是文士分离的社会结构性表征。

文人形态变化始于报刊之形式，文人职业角色完备于报刊之内容。近代文人职业化的成熟标志是以提供娱乐为目的、取道报刊行业而起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小说文学）走向兴盛。19世纪末，文学副刊作为一种吸引读者的手段逐渐成为主要前沿报章的固定栏目，吸引了一批小说作家为其固定的撰稿文人。“考试无用，儒生失业，各奔谋生之路。别无它能者，只有就近奔赴江海口岸，卖文求活，乃不能不弃八股而著小说。”^①其中，发端于上海“十里洋场”、伴随文学副刊成长起来的“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或“礼拜六派”）文人，是清末民初职业文人的代表群体之一。鸳鸯固成双，蝴蝶不单飞，其小说流派又细分为扬派和苏派，精英有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徐枕亚、李涵秋、贡少芹等，他们都是民元之际社会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尽管“鸳蝴派”文人的“靡靡之音”常被后起的“革命-启蒙”新文化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学活动一开始即切中市场脉搏，在近代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实践上确立了“文人”作为一种现代职业的历史意义，为文人职业新途奠定了基石。至此可见，19世纪末期，文人与士大夫这两个原本一体的身份最终分离，相当一部分读书人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仕途窠臼，谋求新的立身空间，使“文人”这一古典文化身份在近代走向商业化、专业化，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职业。

文人职业化进程中的商业化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启蒙与救亡的基调下，主笔文学副刊的职业文人巩固的领地迅速被继起的倡导“启蒙与革命”的新文化人所占据。1919年《新青年》创刊宣称：“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

^① 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282页。

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① 这些标榜“青年精神”的文人们显然抱有更为远大的精神和文化理想，他们批判以“鸳鸯派”为代表的商业化文人的功利主义倾向，在政治理想上又辩证回归到“士”的社会角色。当然，他们恰恰是通过彻底批判士的伦理维系而继承士的天下责任。市场的逻辑固然应当被文人接受，但市场逻辑不应成为文人的最高逻辑。对20世纪激变时代的中国而言，文人应有着高于市场的文学追求——改变文学以改造国民意识，改造国民意识以实现国族复兴。一味迎合市场的职业化是文人风骨的丧失和文人精神的彻底沦落。可以说，《新青年》文化宣言标志着中国的文人阶层正式接受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对文人所处社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

“新文人”是近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第一种称谓。郑振铎称“‘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的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坚决与“古文家”“名士派”“旧文人”割席分疆、划清界限，呼吁“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排斥旧诗旧词”以及“打倒鸳鸯蝴蝶派的代表‘礼拜六’派的文士们”。在新文人们看来，文人这个阶层“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而且要“更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② 可见，他们对“文人”的文化主体功能有了崭新的价值标准——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性。近代知识分子的第二种自我表达是“文化人”。到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文化界出现泛指现代文化工作者的“文化人”的称谓。沈从文在30年代末观察到“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为或自称为‘文化人’”。^③ 在新文人对旧式文人的批判与冲击下，“文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舆论中，已经普遍被视作一个贬义词，被人们惯性地与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和鸳鸯蝴蝶之伪浪漫文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从事人文工作的知识人都有意识地避免

①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载刘运峰主编《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第4页。

②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5、8、9页。

③ 沈从文：《一般或特殊》，《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